
况周颐“校词绝少”发微

张 晖

内容提要 况周颐向来以反对校勘词籍著称。他自称“校词绝少”，然而这一说法与他本人的经历自相矛盾。事实上，况周颐早年在词籍校勘方面已有相当成绩，但终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更大成就。由此，况周颐开始反思校词的局限，并致力于词学理论的建设。况周颐一生与词籍校勘的复杂关系，及其对待校词的矛盾心态，恰好折射出词籍校勘风气在晚清词学史上的主导作用和基石地位。

关键词 况周颐 词籍校勘 晚清词学

况周颐发表过一段著名的反对校勘词籍的言论，他说：

余癖词垂五十年，唯校词绝少。窃尝谓昔人填词，大都陶写性情，流连光景之作。行间句里，一二字之不同，安在执是为得失？乃若词以人重，则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士生今日，载籍极博。经史古子，体大用闳，有志校勘之学，何如择其尤要，致力一二。词吾所好，多读多作可耳。校律犹无容心，矧校字乎？开兹缥帙，铅槧随之。昔人有校讎之说，而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心目中有讎之见存，虽甚佳胜，非吾意所专注。……盖心为校役，订疑思误，丁一确二之不暇，恐读词之乐不可得，即作词之机亦滞矣。如云校毕更读，则扫叶之喻，校之不已，终亦纷其心而弗克相入也。^①

这段话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一卷十二号（1920年），是况周颐《餐樱庖词话》的最后一则，之后又被辑入《蕙风词话》第一卷^②，于是得以广泛流传。这段“夫子自道”，因为鲜明地表达了况周颐反对校勘词籍的态度，所以引起学界的强烈批评。如吴世昌先生就据此对况周颐大加批驳，他说：“蕙风反对校字，极谬。误字乃后人之过，原作者不任其咎。读误讹之词，何似读校正之原文。有时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读书不求甚解，最为可悲。”^③吴熊和先生也据此得出况周颐“颇不以校词为意”、“长于论词而不屑于校词”的结论^④。

然而，仔细考察况周颐的治词经历，却发现事实并不是如他所说的“校词绝少”。况周颐早年不但曾积极从事校词，而且有大量的校词成果问世。也就是说，他的词学实践与他的自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本文拟对此现象加以详细辨析，并试图揭示其背后隐藏着的一些问题。

① 《蕙风词话》卷一第五十八条，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② 《蕙风词话》是从况周颐的多种旧作中辑录而成的，学界早有分析。可参见丁千惠《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年）第二章第二节《成书经过与年代》（第15—17页）、张晖《蕙风词话考》（《中国诗学》第七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75—79页）、孙克强《况周颐词学文献考论》（《文史哲》2005年第1期，第97—102页）及孙克强辑录的《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吴世昌《词林新话》（增订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④ 吴熊和《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6页。

一 况周颐的校词修养

况周颐于光绪十四年(1888)入都,任内阁中书,结识了当时同样担任内阁中书的同乡王鹏运。两人经常晤面,在词学上切磋甚多。其时同僚,尚有端木埙、许玉琢等,他们恰巧都是以词学著称的学者,况周颐优游其间,词学造诣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中尤其受到王鹏运的影响最大。当时王正在全力校刻《四印斋所刻词》,况氏受其熏陶,也逐步走上校词之路。《四印斋所刻词》共刻印词集五十一种^①,况氏负责了其中十三种词集的校字之役,依次是1889年所校的《阳春集》、《东山寓声乐府》、《梅溪词》、《断肠词》、《乐府指迷》;1891年所校的《蚁术词选》;1892年所校的《东山寓声乐府补钞》、《南宋四名臣词集》(与邓鸿仪同校);1893年所校的《逍遥词》、《梅词》、《秋崖词》、《章华词》、《樵庵词》。

1891年,当况周颐校勘《蚁术词选》时,王鹏运称赞他“饬勘精审”^②。由此可见,况周颐从1889年开始校词,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步。不仅如此,《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的整个校刊过程,况周颐也都积极参预,所以王鹏运赞叹说“是役也,订讹补阙,夔笙中翰用力最勤”^③。

自此以后,况周颐便一直嗜好校勘词集。他先后刊印了《粤西词见》(1896年)、《薇省词钞》(1898年)、《东海渔歌》(1914年)、《漱玉词笺》(1915年)等著作(其中后两种为排印本)。刊印虽然不等同于校勘,但刊印的过程中往往包含着校勘,尤其在对后两种词集的刊印过程中,况周颐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来进行文字的校勘,使之成为一时通行的本子。另外缪荃孙于1896年校刊《国朝常州词录》,其中“严定去取,商榷体例,校讎讹错,则夔生之力居多”^④。朱祖谋晚年校勘《云谣集杂曲子》,况周颐也出力不少,且水平甚高^⑤。况周颐在晚年时,嘱咐弟子赵尊岳校刊明词,以了结他生平的一大心愿。赵尊岳后来在《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中记载道:“蕙风先生尝一日见语曰,词籍单行,易多散佚。自汲古辑六十家,而集刻之风浸盛。《彊村丛书》网罗五代,迄于金元,精心校订,尤为声党之大业。惜朱明以后,绍述罕闻。吾子有意者,曷勿溯源以沿流,竟此宏绪耶。”^⑥况周颐卒于1926年,而这些话大约讲于1924年^⑦。可见况周颐即使在晚年的时候,仍然赞赏《彊村丛书》“精心校订”,并对校勘、刻印词集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不是目前通常认为的仅专注于词学理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况周颐在收入上述那段大力否定词籍校勘言论的《餐樱庑词话》、《蕙风词话》中,依然写入了他的一部分校词成果,并试图对校词进行一些规律性的总结。今以《蕙风词话》为例,略举如下:

(1) 择善本。校勘首重版本,晚清以来诸家刻词重视宋元旧本,择善影印校刊。况周颐亦然。如卷四第二十二条提及四印斋刻《稼轩词》覆大德广信本,况周颐说:“(稼轩)[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云:‘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用《史记·淮阴侯传》‘臣追亡者’语,它本‘追’并作‘兴’,直是臆改。此旧刻所以可贵也。”

①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四印斋所刻词》本统计。

② 《四印斋所刻词》,第500页。

③ 《四印斋所刻词》,第879页。

④ 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例言》,见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6页。

⑤ 如朱祖谋校[凤归云]词,校记云:“原本下未有空格,从况周颐校。”俞平伯指出“况校是”(《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俞平伯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⑥ 赵尊岳《明词汇刻》下册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⑦ 赵尊岳校辑明词始于1924年,故将况氏的这段话系于1924年。

(2) 甄伪词。如卷四第十一条辨欧阳修 [生查子] (《元夕》) 词非朱淑真所作。

(3) 考作者。如卷四第二十七条据明廖用贤《尚友录》考出《阳春白雪》卷四中雷北湖应为雷应春。

(4) 校调名。如卷四第二十五条云：“词名 [六么令]，‘么’字近人写作‘么’，一说当作‘么’，作‘么’误。‘么’是宋乐谱字。案白石自制曲 [扬州慢] ‘尽荠麦青青’ ‘荠’字，[长亭怨慢] ‘绿深门户’ ‘门’字，[淡黄柳] ‘明朝又寒食’ ‘又’字，旁谱并作‘么’（它词尚不多见），今‘上’字也。‘六么’之‘么’，未知是否即今‘上’字之‘么’。然作‘么’谊亦未优，不如作‘么’，较近声律家言也。”

(5) 正讹误。况周颐在对词进行正误时，经常调动他丰富的学养。如：

a. 依音韵校词。卷四第二十六条云“梦窗词 [扫花游] (《赠芸隐》) 云‘暖逼书床，带草春摇翠露’，[江神子] (《赠洛北碧茗小庵》) 云‘不放啼红流水透宫沟’，‘逼’、‘透’字，宋本并作‘通’，注‘去声’。作‘逼’、作‘透’，皆后人臆改，不知古音故也。明杨铁崖《东维子集·五月八日纪游三十六天洞灵洞诗》云：‘牛车望气侍箸书，螺女行厨时进供。胡麻留饭阮郎来，林屋刺船毛父通。王生石髓堕手坚，吴客求珠空耳缝。’此诗凡十六韵，皆‘送’、‘宋’韵。‘通’字可作去声，此亦一证。”

b. 依方言校词。卷二第五十二条云“淮海词：‘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今本‘向’改‘何’，非是。‘怎奈向’宋时方言，它宋人词亦有用者。”

c. 依典故校词。如前引以《史记·淮阴侯传》中“臣追亡者”语来校稼轩词。另如卷四第三十五条以“四面”之典来校正彭巽吾 [蝶恋花] 词“四面亭前，面面看花坐”句中的“四面”。再如卷四第三十三条依《晋书》校元遗山 [鹧鸪天] 词。此类例子甚多，不一一枚举。

以上仅举其荦荦大者，然而已经可以看出况周颐对于词籍校勘，虽然不如郑文焯、朱祖谋等人精深，但也有他自己的规模体系，亦不可谓不娴熟。那么，他关于“校词绝少”的自述，至此可以不攻自破了。

二 况周颐的词学观与其校词经历之关系

况周颐的校词素养为他的词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著名的“重、拙、大”理论以及他的词史观都与他的校词经验有着紧密的关联。

况周颐早岁填词，一任性灵。1888年入都之后，体格方为之一变。这其中的变化，就与校词有着直接的关联。况周颐自己曾说：“光绪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词风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校讎，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出，皆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①可见，他本人也承认“得窥词学门径”是得力于“校讎”宋元人词。那么，他的词学理论以及词史观究竟与校词经验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先来看校词与“重、拙、大”理论的关系。所谓“重”，况周颐自己说“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蕙风词话》卷一第四条）又说：“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之诠释也。”（《蕙风词话》卷一第二十条）况氏进一步释“自然”云：“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蕙风词话》卷一第二十三条）如果列一个简单的公式，那就是重 = 沉着 = 自然 = 性灵、书卷，则可以说“重”就是或性灵流露，或书卷酝酿，或两者兼备。况氏又说：“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同上）这些话都与况氏亲身体验相关。况氏早年填词纯作性灵语，其后校词，便不能仅逞天分，须辅以学养，方能成事。故况氏说得到“自然”有两个途径，一为性灵流露，一为书卷酝酿。实则这些都是甘苦之言。而“重”的意义也同样存在于两者之中。

^① 况周颐《餐樱词自序》，见《餐樱词》卷首，《蕙风丛书》本。这段文字，后来徐珂《近词丛话》曾加以引录，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27页。

而重视学养（即书卷酝酿），更是况周颐经过校词之后得出的经验。《蕙风词话》中屡申此说。实则早在1914年为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一书作序时，况周颐就已提出“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①。1914年，正是况氏协助朱祖谋校勘《彊村丛书》之时，所以况周颐会特意提及“学力”云云。

校词的经历同样帮助况周颐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词史观和审美趣味。况周颐一开始协助王鹏运校词时，是从宋元之际的词籍入手的，所以况氏对该段词史悟入最深。而《蕙风词话》中论及宋元之际词人、词作的部分在全书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必然与况周颐早年大量校勘宋元词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论及宋元之际词学之转变，谓：“《须溪词》中，间有轻灵婉丽之作。似乎元明已后词派，导源乎此。岂时代已入元初，风会所趋，不期然而然者耶。”（《蕙风词话》卷二第九十七条）又云：“窃谓词学自宋迄元，乃至云闲等辈，清研婉润，未坠方雅之遗。”（《蕙风词话》卷三第五十六条）都是有心得之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况周颐的某些作家作品论便直接建立在作品的考订校勘之上。如《蕙风词话》卷三第三十九条云“余遍阅元人词，最服膺刘文靖……文靖以性情朴厚胜。其〔菩萨蛮〕（《王利夫寿》）云：‘吾乡先友今谁健？西邻王老时相见。每见忆先公。音容在眼中。今朝故人子。为寿无多事。惟愿岁常丰。年年社酒同。’此余尤为心折者也。”此处“每见忆先公”之“忆”字，况氏校曰：“‘忆’一本作‘说’，细审之，似不如‘忆’字，与下句尤贯合。”相较之下，“忆”字比“说”字更能体现出刘文靖“以性情朴厚胜”的特点，因为“忆”字更见深情。由此反证，况周颐对刘词作出“以性情朴厚胜”的评语是在对刘词进行仔细校勘和用心体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如论元遗山词数则，《蕙风词话》卷四第三十三条属校勘，卷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属评论。则况周颐论词显然以校词为基础，更无庸置疑。

况周颐还利用他校词的基础进行释典。如《蕙风词话》卷四第三十六条云“《汉书·黄霸传》‘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迎送，正颇重听何伤。’‘重’，传容切。元刘敏中《中庵诗余》〔南乡子〕（《老病自戏》）云：‘耳重眼花多。行则欹危语则讹。’‘耳重’即‘重听’，读若‘轻重’之‘重’，仅见。”又如同卷第二十一条亦是释典之作。

从上述可知，况周颐不但曾经积极从事于校词，校词也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更可以看出所谓的“校词绝少”以及校词“非吾意所专注”等等自述，是绝对不能轻信的。

三 别有隐情的反对校词

按理说，况周颐早年在词籍校勘上已有相当的成绩，晚年的词论中，依然可见其早年校词的痕迹。那么，他为何在词籍校勘上不追求更大的成就，反而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逐渐远离校词，撰写词话呢？其实，这个学术上的转折并非是他主观追求的结果，而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前文提到，况周颐1895年之前在北京与王鹏运商讨词学，主要从事校词工作，而且进步很大。而1895年离开北京之后，况周颐便再也没有机会北返定居。1896年，朱祖谋到北京任职，与王鹏运关系日益紧密，两人经常商讨校词的事情。从1898年开始，王鹏运与朱祖谋两人共同校勘《梦窗词》。当时郑文焯刚好入都，也参预了此事^②。这件事在词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其中的意义正如龙榆生所指出的：“其（指王鹏运）始刻《双白》（辛巳三月）亦率意侵板，借广流传，初未应用清代校勘家法以从事于此也。进而搜求善本，如《花间》、《东坡》、《清真》、《稼轩》诸集，始用影刻。

^① 上疆村民重编、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② 郑文焯后来根据王、朱二人的校本对《梦窗词》加以重校，稿本由林玫仪教授在台湾影印出版；并可参见戴亮吉《郑叔问先生年谱》。

迨后与彊村先生约校《梦窗》，乃明定义例，取清儒治经治史之法，转而治词。……王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①可以说，况周颐离开北京之后，晚清词籍校勘之学由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人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当况周颐与王鹏运一起校词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使词籍流传，不但方法不如随后朱、王等人的明确与有效，影响更是远远不如。简而言之，如果况周颐晚离开北京几年，那他就有可能成为晚清词籍校勘的大家。而自从离开北京之后，他在校词方面就失去了继续得到提高的机会。虽然他此后仍在校词，在他的诸多笔记中坚持发表各种校词成果。但比之同时王、朱、郑等人聚集北京，不断有精湛的校词成果面世，不免零散和逊色很多。况氏校词时间远在朱、郑之前，而取得的成果却远不如他们，这一点，况周颐心中一直有隐痛，这不但直接导致他后来对校词持批评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他和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人的私人关系。

王鹏运在给朱祖谋的信中曾称况周颐为“目空一世之况舍人”，又说“夔笙素不满某某，尝与吾两人异趣”^②。“某某”即指郑文焯，这一点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曾提及，如1929年2月16日记载：“此编（指《玉梅后词》）王鹏运曾劝其勿刻，而况不听。序中且极诋郑叔问，所谓某名士老于苏州者也。”况周颐对朱祖谋也有所不满。《天风阁学词日记》1935年6月14日记载：“蕙风好骂，于彊老亦有不满。”1936年3月22日概述张尔田致夏承焘函中的话：“蕙风生平最不满意者，厥为大鹤。仆尝比之两贤相扼。其于彊老，恐亦未必引为同调。尝谓古微但知词耳，叔问则并词而不知。”幸而朱祖谋在遗老中的声望甚高，且为人谦和，性格平易近人，并曾邀请况周颐帮助他编选《宋词三百首》，对况周颐贫困的生活也时常加以援助，所以两人的关系并无大的矛盾。况周颐为何会对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等并世词学校勘大家均有非议，前人向无论及。而我认为，极有可能与况周颐远离北京这个校词中心之后未能在校词上取得大的成就有关。

此外，况周颐生活拮据，也使得他对校勘词籍有心无力。晚清普通士人的经济地位相当低下，况周颐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况周颐自1895年离开京师之后，便漂泊天地之间，流徙不定，生活没有着落，经济尤为拮据。他1895—1898年在南京、扬州；1898—1904年在武昌、常州；1905—1908年在南京；1909—1911年在大通；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始以遗老身份定居上海。其间，曾讲学于武昌白岩书院、武进龙城书院、南京师范学堂，又曾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远赴大通任小官僚，疲于谋生，岂能静心从事词籍的校讎之学？此时况周颐所写的大多都是诗词创作以及可以换来稿酬的掌故笔记之类，漂泊期间刊印的《薇省词钞》（1898年），其实际校勘时间也是在离京之前的1894年（该书《凡例》）。生活的极度不安定，加之况周颐又嗜好鸦片，所以导致他经济极度贫困。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怜其才，将况周颐延揽入府，并说：“我亦知夔笙将来必饿死，但我端方不能看其饿死。”^③则况周颐的贫困确实可以想见。

况周颐晚年定居上海，仅靠撰文为生，经常无法度日^④。《郑孝胥日记》云：“赴余尧衢消寒会，况夔生求助葬母之费，以三十元托朱古微致之。”^⑤况周颐在给刘世珩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过他的贫困。

① 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② 《彊村词剩》卷首《彊村词原序》，《彊村丛书附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8403页。

③ 张尔田《近代词人逸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68页。

④ 这一点，如果了解况周颐晚年在杂志上发表文字之多，就可以明白。19世纪90年代的稿酬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文人耻于卖文的观念也已经改变，大量童生、秀才乃至举人、进士、候补官员都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参见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刊《史林》2000年第2期。又张敏《从稿费制度的实行看晚清上海文化市场的发育》，刊《史林》2001年第2期。

⑤ 《郑孝胥日记》1922年1月19日，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

他说：“每联润资一元（八七五言并同），张迂衡方两碑可各先集五十联，如蒙先惠润资，准十日内呈稿，因此十日内便无须别筹樵米，卖文定例，凡先领润必不误期。联数不拘多少，伏候示遵。寒 生活勿以为笑，幸甚。”^①陈三立在《挽况蕙风舍人》中说他“卖文为活孤芳在，抱古何求万恨真。倘起陶公咏贫士，垂名成就甌生尘”^②，则当时况周颐贫困的生活状况，可见一斑。而校勘词籍不但需要生活安定，而且极费钱。以朱祖谋为例，他为了校刻《彊村丛书》，先后花费近两万金，全靠历年宦囊所得支撑。以况周颐的财力，显然难以承受。他晚年所刊的《东海渔歌》、《漱玉词笺》二书，就明显区别于纯粹的校勘，而有赢利目的存在。

和同时的朱祖谋、郑文焯相比，况周颐在经济上的劣势是显然的。朱祖谋在做遗老之前，先后任吏部侍郎、广东学政等高官。郑文焯是簪缨世家出身，本人又是负有声望的名士，在苏州长年定居，历任江苏巡抚都延请他做幕府。经济情况虽然不能和朱祖谋比，但较之况周颐而言，不啻天上地下。

“近代词人，致力之专且久，而以词为终身事业，盖无有能出周颐右者。”^③但上述原因杂糅到一起，使得况周颐这位在晚清词家中本来“治词最早，用力亦专”^④的人，在词籍校勘方面的成就反而最小。这无疑会成为况周颐的一大心病。他之所以公开反对校词，或许和他不能在校词上取得如朱祖谋等人的成就而带来的巨大失落有关。

四 超越校词的词学目标

前文所论，是从况周颐本人的经历来解释他为何后来不能继续从事校词以及他为何批评校词的部分原因。然而，作为一名在词学上持续用功的学者，他的经历既然不能允许他在校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当他本人意识到在校词上已经无法与同辈抗衡时，他就有意识地开始不再把校词作为治学的最终目标，而致力于词学理论的建设。晚年况周颐关心的是词的创作以及词学理论的总结与阐发，词籍校勘对他而言，不过是前尘往事和论词的一个基础而已。他批评和反对校词，关注点不在校词中随时会出现的枝节性的技术问题，而在思考过分专注于校词会给词学带来的负面因素。如他反对那种专意于“行间句里，一二字之不同”的校勘，他认为这样校勘，只能导致“以小疵累大醇”^⑤。他还说校勘不符合词的本质：“词以人重，则意为先，言外为后。”“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心目中有籛之见存，虽甚佳胜，非吾意所专注。”即指认校词会妨碍词的欣赏。可以看出，况周颐批评的并不是校勘本身，而是批评过分校勘可能会损坏词的“大醇”，是要保护“以和雅温文为主旨”的词的创作与欣赏。况周颐曾长期浸淫在校勘之中，深知校勘的好处，也熟谙校勘的弊端。他所直陈的校词的弊端，在当时肯定有一定的普遍性。晚清词坛盛行校勘之风，下焉者自然鱼龙混杂，故况周颐会愤而斥之。

在对待校勘的态度上，况周颐和王国维有几分相似。王国维研究词学，并无严格的师承，所以他的目光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晚清笼罩词坛的校勘风气。虽然他在撰写《人间词话》之前，也曾对大

① 《近代名人翰墨》（影印本），黄氏忆江南馆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②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别集》，《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0页。

③ 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463页。

④ 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83页。

⑤ 其实早在1899年王鹏运校勘《梦窗词》时制定的“校词五例”中便已有类似的申述：“其校定讹字之可信者，业已据正原文。此外无甚出入，若‘幽芬’之一作‘幽芳’，‘绣被’之一作‘翠被’，浪费楮墨，无关校籛。”（《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13页）

量的词籍下过文献上的苦工夫^①，但他更关心的是词中的精神，是如何对词进行品评，并提出“境界”、“隔”与“不隔”等理论来支撑。在晚清词坛上，无疑以王国维、况周颐两人的词学理论最为精湛，这不仅与他们的天分有关，更和他们在研究词学时，目光不局限于校勘有着重要的关系。但王国维比况周颐更有词学理论上的自觉性，不比况周颐是在没有条件从事校勘的前提下，被迫无奈放弃校词的。也正因为如此，况周颐内心对校词始终依恋，无法真正摆脱，这也是导致他在《蕙风词话》中保存大量校词成果以及他对校词弊端反思不够的原因。

尽管如此，况周颐毕竟脱离了以校勘词籍为中心的晚清词学主流，虽然他的心中有许多失落和不满，但整个事情反而使得他的词学成就能够突破晚清词学校勘的牢笼，慢慢上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较之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人，况周颐在词学上的涉猎无疑更为深广。王、朱、郑等人长期从事于校勘，与况周颐相比，毕竟疏于论说。所以朱祖谋看到况周颐《蕙风词话》时，说自己“不敢为”^②。而况周颐也会暗中嘲弄他们：“古微但知词耳，叔问则并词而不知。”^③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况周颐虽然有着著名的反对校词的言论，但是考察他的生平学术经历，却发现他和校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反对校词，主要是因为他已经突破校词，达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但他脱离校词中心后不能在校词上取得更大成绩的隐痛以及不佳的经济状况等，也可能促使他激烈地反对校词。所以，简单地说况周颐不屑于校词，是不够确切、至少也是失于考察的。

由此我们想到，要正确理解文学史或学术史上的一种现象或是某个观点，就应该把它放入特定的环境中来加以考察。其实这种情形很多，余英时在考察章学诚与戴震两人论学时的心理背景时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术思想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理论，从正面去看，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似无隙可觅。而一考其立说时的特殊心理背景，则往往发现其中别有待发之覆，而且关系甚大者。”^④在这里，这个说法可以得到补充证实。

我们也可以借此进一步深化对晚清词学的理解。目前的词学史研究在讨论晚清词学的时候，都认为王鹏运、朱祖谋重视校勘，郑文焯强调词律，况周颐擅长词论^⑤。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他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晚清以来的词学，其基石与主导学风应该是校勘，新老学者均是在这种校勘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况周颐虽然一向以词学理论闻名，但经过仔细考察，发现他非但不能脱离校词，而且校词经历还曾经给他的词学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许可以给考察晚清以来的词学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学术背景。

[作者简介] 张晖，1977年生。2006年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发表过专著《诗史》等。

^① 参看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中1908—1910年的相关记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5页。又李庆编《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希见史料辑注》第十六节《王国维手抄手校词集题跋校语》（1909—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144页。

^②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9年6月18日记载，夏承焘拜访张相（献之）的时候，张“谓昔在沪，常遇朱古老，尝劝其作词话，古老谓蕙风笔能达之，予则不敢为云云”。

^③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3月22日概述张尔田函中语，前面正文中已引及。

^④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

^⑤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张利群《词学渊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孙维城、张传信《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黄山书社1995年版）等书都基本不涉及况周颐校勘的事实。